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陈冬野 马清槐 周锦如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36

1981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1 千

印数 4,200 册

印张 11 1/4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1.35 元

关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活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工业资本迅速发展的需要，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传播，使配第逐渐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应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且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① 配第在研究中，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说明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和利息等的尝试；他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剩余价值（他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来自工人剩余劳动的思想因素。这些就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马克思对配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配第所创立的“政治算术”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②

这本《政治算术》，就是威廉·配第独创地应用算术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典型著作。他在本书中，列举数字，论证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力量，试图探讨存在于当时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现象中的共同规律。

但是，本书的写作，也象配第的其他经济著作一样，动机在于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它是在 1671 年至 1676 年之间写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8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7—38 页。

的。在这时期，在国外贸易的刺激下，英国的工业资本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工场日益普遍，羊毛生产蒸蒸日上，其他如造船、造币、玻璃制造、酿酒、炼铁等等工业都有所发展。这种情况，要求加速原始资本的积累。积累原始资本，除了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之外，就是加紧掠夺殖民地和争夺国外市场。然而，当时英国的力量仍落在荷兰和法国之后，特别是国外市场和殖民地都在荷、法两国控制之下。因此，如何打垮荷、法两国的优势，争夺国外市场及殖民地，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这种要求的推动之下，英国首先和荷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我们知道，荷兰在经过 1609 年至 1656 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生产迅猛发展，海外贸易甚为繁荣，航海业十分发达。当时荷兰商船遍航世界各地。它所有的商船吨数占全欧洲商船总吨数的四分之三，其造船业则居世界首位。荷兰不单垄断非洲、印度尼西亚、美洲等殖民地的贸易，而且还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殖民地的贸易。在这个时期出入波罗的海的船只有百分之七十属荷兰所有。针对这种情况，英国政府曾多次（1651 年、1660 年、1663 年及 1677 年前后四次）加强航海条例，规定进口商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运，他国与英国殖民地通商，事先须经英国政府批准，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与欧洲各国交易的货物必须在英国转口，以限制荷兰商船的营业，打击荷兰。这种经济上的竞争，终于引起了三次英、荷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从 1651 年开始到 1654 年结束，第二次英荷战争从 1664 年开始到 1667 年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于 1672 年开始到 1674 年结束。）配第写作《政治算术》的时间，正值第三次英荷战争时期。

在这时期，法国在路易十四亲政之下，施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工业，建立商船队，纷纷创设海外贸易公司，以加强对对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当时如加拿大、美洲的路易斯安娜、西

印度群岛均沦入法国之手，他如锡兰、印度、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地方也都为法国所囊括。在这种对外掠夺中，法国的侵略矛头首先针对荷兰，在经过两次对荷战争(第一次在 1667 年至 1668 年，这时作战对象为西班牙和荷兰，第二次在 1672 年至 1678 年)之后，法国掠取荷兰的一些领土，取得了对荷兰的优势。接着，它又转向英国。英、荷两国为了对付法国，乃和瑞典联合，结成三国同盟。但是，由于英国的查理二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勾结(他们二人为表兄弟，前者又依靠后者的财政援助)，三国同盟终于破裂。(第三次英荷战争就是由于英、法两国勾结而引起的。)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斗争有增无已，英国政府在国内动乱和对外战争的双重压力之下，财政困难日趋严重，不得不和荷兰妥协，而结束了第三次英荷战争。法国乃取荷兰而代之，它从英国的盟国变成了英国的主要敌国。

在面临上述荷兰和法国的威胁和国内资产阶级议会反对王权的斗争日趋尖锐的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困难，除了出卖国王的领地外，又增收租税。这种情况，加上内战的破坏和频年歉收，造成全国生产衰退，地租下降，金银缺乏，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正如配第指出的：“由于土地地租普遍下降，加上其他许多原因，整个王国日趋贫困；在整个王国中，以前黄金很多，但是现在，金、银都甚为缺乏；人民找不到可就的行业和职业，……赋税项目繁多而且税率沉重，……产业景况普遍可悲地衰退了”。(本书第 5—6 页)他又指出：“在海军力量的竞赛方面，荷兰人正紧紧地在追趕我们，而法国人则正要迅速超过英、荷两国，看来他们既富有又强盛”。(本书第 6 页)因此，他认为，“英国的教会和国家正面临着和产业所面临的相同的危险。”(本书第 6 页)可见，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英国的统治者处境都日益困难。因此，他们普遍产生悲观情绪，徬徨无已。

但是，上面说过，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争夺国外市场及殖民地，已成为英国统治阶级追求的主要目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如何打垮荷、法两国的优势，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处境困难，产生悲观情绪，他们的切身利益却迫使他们去清除这种悲观思想的阻力，以利于对外行动。作为资产阶级策士的配第，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乃写了这本《政治算术》，为英国资产阶级打气。他鼓吹：“英国的事业和各种问题，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本书第8页）他号召英国的朝野人士（资产阶级）：“次于对共同事业处于怎样的状况有真实的了解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可疑的情况下，都应往其最好的方面设想。……如果没有有力而又明确的根据，绝不轻易绝望。”（本书第5页）在本书中，配第应用算术方法，列举英、荷、法三国的经济数字，论证荷兰、法国不如英国之处，指出：“对英国国王的臣民说来，掌握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本书第87页）他鼓吹英国取荷、法二国而代之。本着他在其代表著作《赋税论》中所提出的主张，他对原始资本积累的各种手段（殖民地制度、国外贸易等等）作了进一步论述，鼓励英国资产阶级努力发展本国产业，争夺国外市场，获取财富（金、银、珠宝），以扩大英国的统治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①

在本书中，配第除了为英国资产阶级筹划如何对外争夺之外，还就如何掠夺殖民地人民向英国资产阶级献策。我们知道，当时爱尔兰和苏格兰是最早遭到英国统治阶级掠夺的殖民地，两国人民曾经不断地掀起反对英格兰殖民者的斗争。因此，英国的统治阶级自十六世纪以来，就一直主张采取种族渗透和劫持的方法，来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维持在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配第在《赋税论》中，对英国统治阶级的这种主张表示过赞同的意见，并为这种主张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本书中，配第仍坚持这种主张，认为：“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原地区的一切动产和居民迁移到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地方去”，“这样做，国王和他的臣民，不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都将比现在更加富强。”（本书第 54 页）不仅如此，他在本书中，仍主张用军队来镇压爱尔兰人民，而且要爱尔兰人民负担镇压他们的英国占领军的经费。他指出：“即使要付出爱尔兰王国的所有租金的四分之一的代价，也必须在爱尔兰派驻一批军队。”（本书第 71 页）

当时，贩运黑奴是英国殖民地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英国殖民者从这种血腥买卖中掠得了巨额的利润。在本书中，配第也鼓吹这种可耻的血腥贸易，宣称：“把黑人（他们劳动量大，消费水平极低）运到美洲殖民地这件事，并不是不足取的。”（本书第 75 页）

不过，在本书中，配第在向资产阶级献策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原理，这些经济原理，在当时说来都是创见。

如上所述，配第在本书中，应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实验哲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配第指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本书第 8 页）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

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本书第8—9页）就这样，他为不能象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实验方法加以证明的社会经济现象，创立了检证的方法。这种政治算术的方法，配第在《赋税论》和《献给英明人士》两书中就已展开说明，在本书中，配第更加有系统地、前后一贯地运用这种方法，使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发展。

例如：在本书中，配第运用各种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他首先根据实际数字进行比较，接着，他又运用推算方法，根据实际数字，推算出另一种数字。他依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又依据人口数目和盈余收益推论出国家的财富。最后，他又在数量的对比中，推论出各种不同物品之间的共同性，从而发现财富的真实基础。他从一蒲式耳小麦和一盎司白银的对比中，推理出小麦和白银有着共同的地方，从而得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 *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 measure*〔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 *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 通过政治算术方法的运用，配第在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时，发现了“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即客观存在的真实基础），使他在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方面能提出一些包含有重要科学因素的思想。所以，马克思又誉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②

③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2页。

在《赋税论》中，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来源。在本书中，他又根据一个人是不是生产财富来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例如，他在比较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商人和官吏、牧师等等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的作用之后，提出：“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和商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的真正支柱。”（本书第23页）当然，他把海员、士兵和农民、工人都同样看成是财富的生产者，是错误的。但是，他把官吏和牧师同农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认为农民和工人是生产者，而官吏和牧师则是不生产的，却是正确的。

在《赋税论》中，他实际上涉及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他进一步对这种观点作了说明。同时，他仍本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见解，把土地和人口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首要因素，并对这两者的经济价值作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人口的价值，他这样指出：“假定英格兰全部人口为六百万人，每人开支为七镑，总共为四千二百万镑；同时又假定土地的地租为八百万镑，所有动产的收益每年在八百万镑以上。这么一来，其余的二千六百万镑，就要靠人民的劳动来提供。这二千六百万镑乘以二十（人群也和土地一样，值二十年的年租），得五亿二千万镑，这个数额就是全部人口的价值。再将这个数字用六百万来除，得八十余英镑。这就是每个男、女、儿童的价值，而壮年人的价值等于这个数额的二倍”。（本书第33页）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口的自然数量（即人口的单纯数目），而在于它的社会数量（即创造财富的能量）。他对人口的估价，都是从它的社会数量出发的。在《赋税论》中，他说：“人口少，才真正贫穷”，就是指人口的社会数量说的。这是我们在提到他的人口论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的。

对于土地，他也抱着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的价

值，不取决于土地的面积（即自然数量），而取决于土地所能提供的产物数量（即社会数量）。他指出：“假如有人想知道某块土地价值多少，那么，正确同时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就必定是，这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本书第 55 页）“纵使是一英亩土地，如果土质肥沃，它就能够生产出二十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谷物，可以养活二十英亩土地所能养活的家畜”。（本书第 11 页）“我认为，能够养活一千人的一千英亩的土地，优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一万英亩的土地。”（本书第 18 页）

在比较英、荷、法三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后，配第又进而论述这三个国家的各种政策，如赋税制度、银行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法律措施以及宗教政策等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决定这个国家采取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他首先指出：“这种政策是依据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而制定的，可不是象少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出自荷兰人的超人智力。”（本书第 25—26 页）“信教自由、资产转让登记制度的采用、关税税率低、银行、贷款业的经营和创设以及商法的制订，都是和上述各种情况同出一源而同归一海的。”（本书第 26 页）他明确指出：“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本书第 11 页。政策二字下面的黑点为作者所加。）

在《赋税论》中，配第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见解。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产品成本降低的原理。他说：“譬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本书第 24 页）

在《赋税论》中，配第把地租（剩余价值）看成是农产品价值扣

除生产费用(种子和工资)以后的余额，实际上把劳动日划分为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在本书中，他又进而论述了工资和地租在数量上的对立关系。他说：“假如农民的工资上涨八分之一，即每日由八便士涨到九便士的话，这时，在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中，农民所分到的份额，就由四十便士增加到四十五便士。其结果，土地的地租，就要由二十便士降为十五便士”。(本书第34页)于是，他得出结论：“随着各种产业和新奇技艺的增加，农业便趋向衰落，不然的话，农民的工资就要上涨，其结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本书第33页)后来，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时，对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所作的论述，实际上是对配第在本书中提出的工资上涨，地租就会下降的原理的发展。

在《赋税论》中，配第曾暗示金银是谷物的等价物，并对货币所以能够成为价值尺度的道理作了阐述。在本书中，他更进一步指出：“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象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本书第24页)认为货币就是一般的财富。虽然，他把金、银看成就是一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重商主义重视金银甚于一般商品的影响，但是，他在把金、银看成是一般商品的基础上，把金银规定为一般的财富，无异阐明了金银被固定作货币的道理。

在《赋税论》中，他谈到剩余价值的另一形式——利息，他把利息看成是资本的收入。在本书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利率的高低，是不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它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他说：“利息的降低却不是任何为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所造成的，现在只要有有力的担保，便能借到利息更低的贷款，因为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于货币增加的结果。”(本书第76页)他在这里所说的货币，自然是借贷资本。因此，他明确指出了利率的涨落与借贷资本的供应

量成反比例的关系，从而接触到了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

由上述可见，配第在《赋税论》中所阐明的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在本书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通过政治算术方法得到检证。这些理论的科学真理成份，最先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加以革命的变革，创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重新翻开这部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看看配第如何通过政治算术的方法，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探索并发现它（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赖以建立的客观的真实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帮助。

1960年，译者曾根据日本岩波书店1955年出版的日译本将本书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据英国剑桥大学1899年版本重译，供读者参阅。

译 者

Political Arithmetick,

O 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Husbandry, Manufacture, Commerce, Fishery, Artizans, Seamen, Soldiers; Publick Revenues, Interest, Taxes, Superlucration, Registries, Banks; Valuation of Men, Increasing of Seamen, of Militia's, Harbours, Situation, Shipping, Power at Sea, &c. As the same relates to every Country in general,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Territories of His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and his Neighbours of Holland, Zealand, and France.

By Sir WILLIAM PETTY,
Late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Printed for Robert Clavel at the Peacock,
and Hen. Mortlock at the Phoenix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90.

总 目 次

| | |
|---|----|
| 呈辞 | 3 |
| 政治算术 | |
| 原序 | 5 |
|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①(目次) | |
| 第一章 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 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 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在这方面,特别是航 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 | 11 |
| 第二章 某些赋税和义捐,会使王国的财富增加而不是减少。 | 35 |
| 第三章 法国,由于天然而永久的障碍,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无 法在海洋力量方面超过英国人或荷兰人。 | 46 |
| 第四章 英国国王所有的人口和领土对财富和力量所具有的 重要意义,就天然情况而论,同法国所有的人口和领土 大体②相同。 | 53 |
| 第五章 阻止英国强大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的和能够消除 的。 | 68 |

① 本书完卷之后,配第曾请人手抄数份,赠送友人和有关人士。这些手抄本,有的曾由配第作了修改,各本内容多少有些出入,它们分别由苏斯威尔(Robert Southwell)、罗林森(Rawlinson)等人保存。脚注中的 S 本就是指苏斯威尔保存的手抄本,R 本就是指罗林森保存的手抄本。此外,还有一种盗印本,脚注中的 G 本就是指这种盗印本。——译者

S 本(苏斯威尔手抄本,下同)没有“主要结论”表(目次)。R 本(罗林森手抄本,下同)有。——赫尔(C. H. Hull)

② R 本没有“大体”两字。——赫尔

| | |
|--|----|
| 第六章 英国的权力和财富，在最近四十年中有所增长。 | 74 |
| 第七章 以英国国王的臣民全部开支的十分之一，——如果 这一部分能经常征收到手的话，——足可维持十万① 名步兵、三万②名骑兵和四万名水兵，以及支付政府其 他一切日常和临时的开支。 | 78 |
| 第八章 在英国国王的臣民中间，存在着足够的游闲人手，他 们每年可以比现在多赚二百万镑的收入，并且存在着 足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现成的、合适的职业。 | 80 |
| 第九章 我国拥有经营本国产业的足够资金。 | 84 |
| 第十章 英国国王的臣民有充裕而方便的资本经营整个商业 世界的贸易。 | 86 |

① 第七章标题作“一万”，应按四万订正，参看本书第78页。——译者

② 第七章标题和正文都作“四万”，十万正确，参看本书第78页。——译者

呈　　辞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①

陛下：

际茲每个人都在筹划向您恭献某种适宜于庆贺陛下荣登万福的王位的贺礼之时，我也不揣冒昧，将先父很久以前所写的旨在说明英国王朝的力量和威势的一本书，奉献给您。

这本书，先父题名为《政治算术》^②。因为，凡关于统治的事

^① 在 R 本和 S 本中，有下引的原作者致查理二世的献辞（下引的献辞根据 S 本）。——赫尔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
愿我的话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

由于敢任意全部否定算术这一门学科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认为算术应用到收入事项以外的国家事务极为必要的人，也是极少数的。因此，为了一些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陛下的合格的仆人的年轻贵族们起见，我敢于在本篇论文所述的十点政治性的结论中，指出常见而平易的计算的效用。这里，我衷心希望陛下能饶恕我将庸俗的技艺运用到具有崇高性质的各种问题和我自己的职业和能力所不能接触到的各种问题上面。但是，由于任何不拔、高超的事理，都必定有其浅薄、平凡的来源，所以我衷心希望，我做这件事情，决不是狂妄非份，同时，也不至于受到陛下叱责。因为这种努力是正当的……”——原文到这里为止。——译者

^② 配第似乎是这一句有名术语的发明人。这句术语出现在配第所著《论二重比》一文(1674年)前面致新城公爵(Duke of Newcastle)一封书信的一段文字中。因为它反映了配第本人对他的新科学的看法，所以引述如下。——赫尔

“我的奥格耳爵士(Lord Ogle)现在正深切注意教育他的儿子，要将他的儿子培养成杰出的人物。由于想向爵士致意和表明我对爵士历来努力的谢意，我拜访了爵士，不单教公子一些数学上的知识，而且也教以各种各样的事物、材料以及现象，使他把数学运用到这些东西上面。因为线和数字离开了事物、材料和现象，就如同琵琶没有弦或者没有弹者一样。因为，爵士哟！在世界上尚有值得进一步加以提倡的政治算术和几何学正义(Geometrical Justice)。世上的错误和缺陷，即使能通过机智、修辞和利

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所有的人都把先父看做是这一启示方法的发明人^①。这种方法，就是用一种极普通的科学原理来说明世界中混乱而错综的情况。如果不是这部论文所述的学理引起了法国人不满的话，它们早就在很久以前就公诸社会，并获得追随者了，同时它们也许不必等到今天，早就被人们利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了。

出版本书的目的，是在于增进□陛下治世的福祉和满足学者对它所抱的期望；同时也在于纪念仁慈的先父和向伟大的君王致礼；此外还在于表达我对伟大的君王所抱的热诚与敬意，这应是陛下所抱的最高宿愿。

陛下的无比忠诚而又无比恭顺的臣民

谢耳本^②

害关系使其减轻，但决不能因此就获得医治，原因是：医治人世的虚妄、失调及矛盾，决不是靠罗列修饰得极好的、押了韵的美丽词句，并借助于最美妙的风琴有节奏、有抑扬的伴奏的冗长的说教所能做到的。至于满篇自我吹嘘、听来很悦耳而且在形式上修饰得很动听的一派胡言，就更不会起什么作用。这种情况，和将白兰地酒或蜂蜜掺进质量低劣的葡萄酒中去，不会提高酒的质量，或者把大量胡椒或沙糖倒入烧坏的菜肴中，不会改变菜肴的味道的情况没有二致，因为事物是不愿意让人弄坏的 (Nam Res non sunt male administrari)。”(配第所著《论二重比》前面致新城公爵的信。) 这被看作是第一次使用“Political Arithmetik”(政治算术)这句术语的例子。(鲍尔 [S. Bauer]: 《政治算术史》，见帕尔格雷夫 [Palgrave] 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第 1 卷，第 56 页。) 但是，配第想出这句术语，比这更早。他在给安格烈沙爵士 (Lord Anglesea) 的信中 (1672 年 12 月 17 日)，就用了这句术语。(菲茨莫利斯 [E. Fitzmaurice]: 《威廉·配第传》，第 158 页。) 同时，在本书的序言中他把本书称作“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赫尔

^① 参看 C. 达芬南(C. Davenant)《政治和商业论文集》第 1 卷，第 128 页。——赫尔

^② Shelborne(Shelburne)是配第的长子，名叫查理 (Charles Petty) 生于 1673 年，1696 年逝世。1688 年被叙为谢耳本男爵 (Baron of Shelburne)，成为爱尔兰的贵族。——赫尔